

诤诤之声

——关于新世纪文学的理性思考

E E ZHISHENG

GUANYU XINSHIJI WENXUE DE LIXING SIKAO

张丽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诤诤之声

——关于新世纪文学的理性思考

E E ZHISHENG

GUANYU XINSHIJI WENXUE DE LIXING SIKAO

张丽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诤诤之声：关于新世纪文学的理性思考 / 张丽军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0

ISBN 978 - 7 - 5161 - 0489 - 7

I. ①诤…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 文学研究
IV. ①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5791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约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李 莉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人	赵剑英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64040843 (编辑)	64058741 (宣传)	64070619 (网站)
	010 - 64030272 (批发)	64046282 (团购)	84029450 (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75	插 页	2
字 数	232 千字		
定 价	4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众声喧哗中的“这一个”

——序张丽军的新著《谔谔之声》

文学批评是一种创造性书写，需要写作者个人情感、价值立场和审美态度的充分投入。好的文学批评应该是一种有情感、有生命、有体温、有关怀的写作，应该呈现为带有个人精神印记的批评风格，而不是一味地生搬硬套西方学术术语而晦涩难懂。张丽军博士的学术新著《谔谔之声——关于新世纪文学的理性思考》呈现了他近几年来对新世纪中国文学的思考，其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一种犀利尖锐的批评风格，而且在批评锋芒背后展现的是一种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丽军博士的新世纪文学批评就从个体的审美思考和生命深层体验中走出来，以一种“谔谔之声”汇入了众声喧哗的文学思潮之中，成为多元对话声音的独特“这一个”。

张丽军在文学批评过程中追求源自内心真实体验的理性声音。他在读博期间发表的一篇与国内学者就“文学人民性”问题进行争鸣的文章，就引起了较大关注。2008年他师从我做博士后研究，其间，他觉得上海学者对余华长篇小说《兄弟》的评价与自己对《兄弟》的阅读体验反差很大，就写了一篇商榷性的文章。他跟我谈起自己内心的犹豫和矛盾。我就鼓励他说：“学术争鸣是可以的，只要真正限定在学术的范围内，什么都是可以讨论的。”虽然文章所提出的所谓“上海声音”，我不赞成，我以为学术是公共的，并没有什么上海、北京之分，完全没有必要就一部作品的评论提炼出一个所谓的“上海声音”。但客观上说，他文章的观点还是能自圆其说、值得重视的。他没有拘谨在《兄弟》的文本，而是从对《兄弟》的两极对立现象分析，拓展到对国内文学批评界不良现状的批评。他归纳出了当代文学批评三种不良症候：一是非捧即骂的意气性、二元对立思维批评症候。二是创作引导批评、批评家跟着作家跑的“顺势思维”批评症候。三是祛除批判理性精神、唯市场论

批评症候。而且，他还进一步探索这三种不良的文化根源所在，以求由表及里、追根溯源，推进新世纪文学创作与批评生产机制的良性建设。

张丽军不仅将对作家及其文本的细读式批评置于当代文坛或 20 世纪文学史的历史维度中进行思考评价，而且力图从对个案的解读中，用一种整体性的审美视野来思考更为宏大的全局性问题或相关文学理论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渐渐从“向内转”开始变为“向外突”，文学批评在文化批评的潮流中再次开始寻求文学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的多重精神关联。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张丽军博士对山西作家张平的文学创作提出了新的思考，把一些人所认为张平创作的“反腐文学”阐释为“新政治写作”。这种“新政治写作”是从一百多年的梁启超的“政治写作”概念中生发出来的，切中了张平小说创作的时代意义和价值。这种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是张丽军博士在梳理从赵树理的“不要丝绸要织布”的“为农民写作”到张平的“不要人参要萝卜”的“生生世世为老百姓写作”的山西作家文学人民性传统基础上得出来的结论。除了对张平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外，张丽军还分析了毕孝立的《海选》、姜翕芬的《留村察看》等新世纪非专业性、具有深厚乡村生活经验作家的“新政治写作”，呈现了新世纪民间知识分子对“海选”等“乡村民主进程”的审美思考。

《涔涔之声》中的“新世纪文学向何处去”一章，呈现了张丽军博士对新世纪文学的理论建构意识。在“新世纪底层文学：新美学原则的崛起”一节中，他认为，新世纪底层文学的“文学性”既表现为对既有文学审美观念的更新，也表现为对以往逻辑秩序的“突破”，对被遮蔽世界的发现。底层文学的“文学性”和思想性不是对立、割裂的。为此，张丽军博士从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历史维度出发，在总结五四文学、左翼文学、纯文学的审美经验基础上，提出了新世纪底层文学审美原则的三个向度：1. 以底层替代阶级，而不失革命性。2. 以底层文学取代纯文学，而不失文学性。3. 代言，而不失批评性。在新世纪文学出路是“大众化”还是“小众化”的文学论争中，张丽军提出在市场经济多元价值观与多元文化需求下，文学注定了要走向一种多元格局。单一的、精英的“小众化”文学观念必然会扼杀文学的生机，不仅不是“尊荣的”，而且会遭到大众的唾弃。在当代小说面临困境，尤其是当代

中国底层大众再次呼唤文学的时代语境下，发扬中国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文学传统，赓续现代文学作家与底层大众相融合的精神血脉，建构一种代表底层弱势群体利益的当代大众文学，已经是文化精英所需回应的时代课题和应承担的基本道义。这也是维系文学的生命力、避免文学消亡的根本途径之一。

乡土文学是张丽军近些年来文学批评关注的中心。新世纪文学何以走向农民，不仅仅是一个乡土文学的问题，也是攸关新世纪文学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所有文学爱好者和批评者关注的问题。张丽军结合自己的阅读和思考，从赵树理广受农民欢迎的“农民文学”到老舍与城市底层心心相通的“城市底层叙述”，论述了新世纪文学重建与农民大众的深厚精神联系的必要性及其可能途径。面对新世纪以来乡土中国的历史剧变，张丽军从贾平凹的《秦腔》和《高兴》两部长篇小说的解读中，不仅体察到了作家为新世纪中国农民唱一曲挽歌的精神悲剧，而且从中发现了刘高兴为代表的乡土中国进城农民“自觉认同城市”、放弃个体的幸福转而追求群体性解放的新道路新探索的意义和价值。

作为一位齐鲁大地上的研究者，张丽军对山东作家的文学创作，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他不仅热情推荐山东青年作家作品，对80年代文学鲁军给予密切关注，而且尖锐指出阻滞新世纪山东文学“难美”飞翔的各种因素，为新世纪鲁军崛起进行了新的理论探索。他敏锐捕捉到了赵德发小说创作中深邃的伦理道德精神，阐释了《君子梦》小说文本中两代中国农民近百年来对“谦谦君子”的伦理梦想追求，把这两代农民的个体自我追求与新中国六十年代“狠斗私字一闪念”、“公字庄”的集体乌托邦梦想联系在一起，呈现了从宋明理学到当代道德乌托邦建构的内在精神脉络，为20世纪中国道德伦理文化危机及新世纪伦理文化重建提供了来自历史的多维度审美思考。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张丽军博士的“谔谔之声”有的或许显得粗疏，不够细密；一些理论观点有待商榷，需要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但是，这种敢于对话和争鸣的批评勇气，这种把自己生命体验和现实人文关怀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批评姿态，与发自内心深处的、力求明白晓畅的批评话语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也是新世纪多元文学批评声

音中较为可贵的“这一个”。

是为序。

吴义勤

2011 年 12 月匆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目 录

第一章 新世纪文学向何处去	(1)
第一节 新世纪底层文学：新美学原则的崛起	(1)
一、底层文学的思想传统与精神溯源	(1)
二、“纯文学”的迷津和新世纪文学的自我救赎	(3)
三、新世纪底层文学的精神特质探寻	(6)
第二节 新世纪中国文学陷入“中年危机”了吗	(11)
一、断裂式现代性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二次断裂	(11)
二、新时期“中年危机”与被遮蔽的新世纪青春文学	(13)
三、文化困境、代际矛盾与 80 后作家的“成长危机”	(15)
第三节 新世纪文学人民性的溯源与重申	(18)
第四节 文化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学批评走向何方	(28)
一、谨慎欢迎的“诡异”：力挺余华的先声	(30)
二、解读《兄弟》的逻辑前提，是否不证自明	(32)
三、余华《兄弟》的“冒犯”，是否创造了一种新的 叙事风格	(35)
四、从《兄弟》“上海讨论会”看当代文学批评的 三种症候	(37)
五、当代文学批评症候根源的文化探寻	(39)
第五节 新世纪文学的出路是“大众化”还是“小众化”	(41)
一、中国现代小说的大众化基因和大众文学传统	(42)
二、民粹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	(43)
三、“去政治化”和“物质主义”：当代小说的困境及其 突围	(46)
第六节 当代中国诗歌如何突围	(48)
一、“荒漠化”的精神文化背景	(49)

二、新世纪诗歌的整体性困境与精神迷失	(50)
三、重构伟大的诗歌传统和文化伦理	(52)
第七节 “茅奖”，你何时不再矛盾	(55)
一、“茅奖”：一开始就存在的暧昧与遗憾	(56)
二、“无边的质疑”中的第七届“茅奖”	(59)
三、“茅奖”争议背后的“潜规则”、“集体无意识”	(64)
第二章 新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中国经验”	(68)
第一节 新世纪文学何以走向农民？	(68)
一、打破五四新文学与农民的“隔膜”，创作农民文学	(69)
二、立志为农民写作，做“文摊文学家”	(70)
三、与农民血脉相通，塑造时代典型的农民形象	(74)
第二节 新世纪乡土中国现代性裂变的审美镜像	(77)
一、《秦腔》：乡土中国的衰竭心像	(77)
二、《高兴》：进城农民工的“垃圾”物像	(81)
三、独异的中国现代性形象：最后一位农民与认同城市、 寻求群体解放的农民工	(85)
第三节 重建新世纪中国伦理的文学思考	(90)
一、百年伦理危机的审美显现	(90)
二、君子梦：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在民间的一脉余香	(92)
三、平常禅：传统佛教伦理文化的当代转向	(95)
四、如何重建新世纪中国伦理	(98)
第四节 回归“仁义”传统，抑或另建“生活伦理”	(100)
一、从欲望解放到泛滥：“美丽的时代病毒”	(101)
二、金德义：回归“仁义”传统的道德消毒剂	(102)
三、从钱二妮到金桃：新世纪女性的现代“生活伦理”	(104)
四、结语：《土窑》伦理叙事的突破与局限	(106)
第五节 穿越时空的魅惑之音与乡土中国的伦理悲剧	(107)
一、紫箫黯然低吟，传统乡村伦理文化的悲剧	(107)
二、紫箫魅惑天地，穿透黑暗时空的爱情之音	(109)
三、紫箫悲音不绝，叹新时期乡村伦理危机	(110)
第六节 90后“白毛女”为什么愿嫁“黄世仁”	(112)

一、五四“娜拉”与新世纪 90 后“白毛女”	(113)
二、从意识形态化到历史还原的两个“黄世仁”	(114)
三、90 后“白毛女”主体人格的陷落与当代中国社会的 “无物之阵”	(116)
四、90 后“白毛女”的救赎之路何在	(118)
第七节 百年农民与城市关系的审美嬗变	(120)
一、“以善抗恶”：祥子与城市的对峙和覆灭	(122)
二、“以恶抗恶”：五龙与城市的仇恨和征服	(123)
三、“以善寻善”：高兴与城市的平等对话	(125)
四、“车”、“米”、“肾”、“垃圾”：农民与城市关系的 精神隐喻	(128)
五、结语	(130)
第三章 新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政治写作”	(132)
第一节 强烈现实精神和社会主义理念的“新政治写作”	(132)
一、从家庭悲情叙事到政治写作的审美抉择	(133)
二、永生永世为老百姓写作：从赵树理到张平的文学 人民性传统	(136)
三、社会主义理念是张平政治小说的思想核心	(138)
四、张平新政治写作：重新建构政治与文学关系	(142)
第二节 重建新世纪红色文化的艺术探索	(146)
一、新世纪《红灯记》改编剧的历史背景	(146)
二、《红灯记》改编的美学探寻	(148)
三、重构“红色”文化：红色经典改编的艺术功能	(153)
四、结语	(155)
第三节 浑圆深厚的民间正气之音	(156)
第四节 新世纪中国农村政治现代化的文学图景	(159)
第五节 当代中国乡村政治生态的全景展现和崭新探索	(162)
第六节 乌托邦·政治狂欢·漫长历史梦魇之罪	(164)
一、民间、传统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共时性逻辑结构	(165)
二、革命、青春与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政治狂欢	(167)
三、漫长的历史梦魇之罪	(170)

四、从语言、结构形式到思想内容的幽默神韵	(173)
第四章 新世纪山东文学研究	(178)
第一节 论齐鲁文化与新世纪山东文学的“难美”飞翔	(178)
一、打破齐鲁文化的大陆型山地文化专制，建构海洋型的 开放性文化风土	(188)
二、继承五四山东作家的文化革新精神，实现新世纪 齐鲁文化的思想革命	(189)
三、总结山东作家的文体与形式创新精神，化“沉重” 为“难美”飞翔	(190)
第二节 新世纪农民对城市的审美想象与情感律动	(191)
一、莱农马全的“幸福”想象	(192)
二、幼小心灵的疼与痛	(194)
第三节 新世纪 70 后作家的魔幻性审美书写	(197)
一、艺术初创期的写意性描绘	(197)
二、艺术探索期的魔幻性书写	(199)
三、“乌山”、“桃镇”里的“隐身王国”	(201)
四、结语	(205)
第四节 空间现代性视阈下的文学济南	(206)
第五节 “夜晚之心”的灵魂舞蹈	(209)
一、穿越庸常生活的“夜晚之心”	(210)
二、“夜晚之心”的柔软与坚韧	(211)
三、灵魂飞翔的翅膀	(214)
第六节 “穿越夜的胸膛”的琴与灯	(216)
一、“黑夜”里绽放的花朵	(216)
二、弹奏“夜歌”的独弦琴	(217)
三、“穿越夜的胸膛”的灯盏	(219)
第七节 在时间和白发的眠处，一朵开放在尘世边缘的花	(221)
一、时间的镜子	(221)
二、暮色、风声与孤独的行者	(223)
三、花、青鸟与大地的爱意	(225)

第一章

新世纪文学向何处去

第一节 新世纪底层文学:新美学原则的崛起

一、底层文学的思想传统与精神溯源

从文学史来看,对底层穷人处境的描写与呈现,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思想主题。从古至今,中国文学有着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传统,以同情与吁求的态度对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和生命呼声进行传达,体现出一种珍贵的人道主义思想。作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源头的《诗经》,其“国风”篇中许多篇章描绘了底层劳动人民日常生活的艰辛,有一些篇章还对底层人民受剥削和压迫的不幸命运进行血泪般控诉,表达底层人民对压迫者的仇恨和对自由理想生活的向往。南北朝时期,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记述了一个“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表达了一种受压迫底层对现实压迫的规避和对自由平等“乌托邦”世界的幻想。唐代杜甫的“三吏三别”中的《石壕吏》表现了底层人民在社会动乱中受欺凌和压迫的悲惨命运;尤其突出的是唐代白居易的文学作品,不仅在语言上力求通俗易懂、妇孺皆知,而且在思想情感上与底层一致。《卖炭翁》就是这样一个出色的底层叙述文本。

到了近代,中国文学在叙述底层、表现底层的时候,也遇到了语言的障碍,即文学作品语言与底层民众语言脱离的问题。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启蒙民众,尤其是众多底层民众的重要性。文学走向底层民众渐渐成为一种思想变革潮流。发生于晚清的、要求文学语言走向底层民众的白话文运动成为日后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的源头,为五四时期

的白话文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了道路。正是在这样的语言变革需求的时代背景下，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要求彻底废除文言文、倡导白话文的《文学改良刍议》，发出了“文学革命”第一声，引起了一场变革中国语言、文学、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因此，源自晚清、成功于五四的白话文运动的大众化诉求，提倡用底层大众的语言来言说底层大众，为现代文学与底层受众群体建立了一条能够进行精神沟通的语言渠道。

从五四文学到左翼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了比较明显的断裂。五四文学是在“人的文学”的思想视野下的追求个性解放、表现个体的心理世界与精神冲突、反对封建传统思想束缚的人道主义文学，塑造的底层形象是愚昧的、病态的、奴性意识的；左翼文学是在“阶级性”的现代性思想视野下对革命群体中的人进行审美想象和建构，表现的是阶级对立世界中的经济矛盾和不同阶级间的冲突，描绘的底层形象是阶级意识觉醒的、走向革命的觉醒者与在愚昧和觉醒之间挣扎的过渡者形象。

早在1917年3月，李大钊在《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一文中就提出了“革命文学”。1922年4月，之常在《文学旬刊》第35期发表《支配社会底文学论》，在文学界最早提出具有阶级意识的“革命的文学”的主张。“侵害第四阶级底铁索，传统思想固然是一部分，现在底经济组织的确是主要的成分。第四阶级者要想扭断这条铁索，非将现在底经济组织推翻不可，非将无产阶级者联合起来，革第三阶级底命不可。……文学是人类活动底结晶，传达感情底利器，新时代底指导者，鞭策者。国民文学底功用是将一人底热情传达他人，站在新时代底莅临底前部。时代蜕变，思想和环境种种变迁，文学当然也是生长的，与时代俱变的。……总之，今日底文学是人类活动底结晶，新时代底先驱，为人生的，支配社会的，革命的。”^[1]之常的理论意义不仅在于他最早在文坛上提出了革命文学的主张，更为可贵的是他是运用马克思阶级对立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来对革命文学进行阶级性的现代性思想审视，直接指向了社会最底层的“第四阶级”。1924年11月，沈泽民发表的《文学与革命的文学》是中国左翼文学的一篇极为重要的理论文章，认为真正的“革命文学”绝不是作家在革命的幻想中产生的，而是在革命实践中造就的；也不是仅仅“外面敷着‘血’和‘泪’的文章”即可

成为革命文学的。“血”和“泪”不是所谓的“革命文学”的装饰品，它们真正昭示的意义是“文学的阶级性”。至此，左翼文学的本质特征——阶级性——已经被清楚揭示出来。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新文学尽管有着非常明确的通俗化、大众化指向与诉求，但是却被作家的知识分子精英气质和启蒙文化理想所阻隔，而无法与底层民众真正融为一体。左翼文学正是看到了五四新文学的内在接受局限性，而从思想根源处来确立一种指向底层、以底层为叙述主体的新美学原则。蒋光慈、洪深、茅盾等作家这一时期的作品较为成功地实践了这一美学原则，塑造了一系列较为成功的底层民众觉醒者形象，对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构成新世纪中国底层文学的精神资源，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美学经验。

二、“纯文学”的迷津和新世纪文学的自我救赎

左翼文学的阶级性美学原则日益僵化、模式化，给十七年文学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限制，日渐成为审美想象的桎梏。“文革”结束后，随着文艺政策的调整，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与西方美学理论接轨的新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解构主义等众多文学理论纷纷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其中英美新批评等文论对文学性的倡导对新时期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纯文学、文学性、向内转，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的十多年里成为批评家、学者的非常时尚的文学概念术语，乃至一些作家也操持着这些术语来显现对文学的理解。

毫无疑问，纯文学的概念具有很强的先锋性意义和价值，在极大程度上颠覆了以往的文学附属于政治的、文学服务政治的意识形态樊笼，使文学审美属性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大大推进了迟滞已久的中国文学审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更重要的是，由此文学获得了一种独立的、自足的精神品格，一种奠基于科学性的语言艺术本源性存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大批带有语言艺术实验品格属性的形式创新的文学作品出现，形成了纯文学创作潮流，一时间马原、洪峰、格非、叶兆言、苏童、余华、孙甘露等作家构成了影响极大的先锋派作家群。

然而，对文学形式实验的过度推崇和对文学性的过分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另一种遮蔽：即意义的迷失、情感的匮乏以及作家与大地、民众、生活内在精神联系的缺失。在一些所谓的纯文学作家那里，文学就是游戏、娱乐，作家就是一个码字工。文学的思想性、精神性维度被“文学性”宰割掉了，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等多重紧密的联系被简单化约，乃至剥离开来，影响所及，以至于今天的许多80后青春作家缺失对文学的敬畏感。可见，纯文学的兴起在极大推动中国作家对文学内在语言艺术审美属性进行关注、倾尽全力的时候，却也在无意之中斩断了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等外部世界的精神联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进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三农问题”和城市弱势群体的出现。经济学家孙立平提出“断裂”的概念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失衡问题，“一个断裂的社会，并不是仅仅使社会断裂成两个部分，而是断裂成多个部分。这种断裂甚至发生在城市本身”^[2]。断裂社会边缘位置的农民和城市弱势群体正日益沦落为庞大的底层世界。

面对新世纪乡土中国城市化现代转型的加速和底层生存世界的持续恶化，文学有何作为？如何呈现当代底层在社会转型期的情感震颤？“乡土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发展到今天正在经历着深刻而痛苦的裂变。……‘三农问题’比任何时候都变得突出，‘三农问题’的书写也比任何时候变得更加艰难。”^[3]毛泽东曾在致信杨绍萱、齐燕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真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4]。而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状况恰好与左翼文学，以及在左翼文学影响下的延安文学中的工农大众主体地位构成一个鲜明对比，毛泽东所言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又重新统治着舞台；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乡村叙事题材渐趋萎缩，即使城市题材的文学也是如朱文的小说名字一样，“把穷人统统打昏”，富人、白领、小资、中产阶级成为文学叙述的主要对象，物质、欲望、性、下半身成为文学写作的关键词，膨胀的物质欲望极大地积压了文学的审美空间。

不仅如此，文学还面临着更大层面的精神危机。因为经济发展主

义、GDP 的物质欲望诉求达到了高潮的时代，还带来了包括社会制度、价值准则、心理意识和精神维度的整体性扭曲，加速了文化伦理的崩溃，造成灵魂异化的时代精神状况。“一旦社会滑进了以‘效益’为基本曲线的‘发展’轨道之后，所有那些不能迅速兑换成现钱的事物：诗、爱情、哲学、良心、尊严感以及那个在八十年代初风靡全国的‘哥德巴赫猜想’……都势必逐渐遭人冷落，人心的天平向一面严重倾斜。……不只是工厂倒闭、失业人口增加，更是教育败坏、生态恶化，是一部分执法机构的逐渐流氓化、社会的信用体系日趋瓦解，是道德水准的普遍下降。”^[5]正是在这种“新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拥有物质多少成为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整个社会迅速“物质化”，处于一种整体性的精神困境和思想危机之中，一种类似于鲁迅所言的“无物之阵”重新笼罩在新世纪的中国天空。

文学如何回应当代中国社会、生活问题？如何回应当下的精神、文化诉求？这是文学所无法回避的问题。文学不关心底层民众的生活、精神文化诉求，底层民众又怎么可能来关注文学？乃至传出了后现代主义式的“文学死亡”之声。正是在这样一个文学濒临“死亡”的文化语境下，一种“向外突围”的审美文化声音开始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越来越清晰地传达出来，乃至汇成一股强大的审美思潮。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随着詹姆逊、福柯、布迪厄等人的批评理念和新历史主义思想的传播，“向外突围”的审美文化思潮成为穿越“新意识形态”的“无物之阵”的重要精神力量和思想路径，一时间介入性写作、现实精神写作、打工诗歌、“人民文学重新出发”、在生存中写作、新左翼文学、新政治写作等新审美理念纷纷涌现。底层文学就是众多“向外突围”审美文化思潮中的一个。随着时间的演进，一些概念如昙花一现，但是底层文学却因为有着深厚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左翼文学精神血脉而越显现出强劲的生命力。

2004 年曹征路小说《那儿》的发表，标志着底层文学已经从“向外突围”的审美文化思潮中脱颖而出，终于从学者、批评家的“底层召唤”转换为审美创作实践，从对红色文化经典的回潮和重构中孕育出新世纪的、具有“英特纳雄耐尔”光泽的底层文学，一时成为文坛瞩目的焦点。此后，陈应松、王祥夫、刘庆邦、刘继明、罗伟章等作家汇入底层文学之中，成为新世纪文学挣脱纯文学的迷津、进行自我救赎精神突

围的重要方式。

三、新世纪底层文学的精神特质探寻

1. 以底层替代阶级，而不失革命性

学者刘旭指出：“‘底层’一词的源头不在中国，‘底层’在中国最早出现时也与国外理论中的‘底层’无多大联系，这是一个直接指向‘弱势’群体的直观概念：所谓‘底层’，就是处于社会最下层的人群。这是个不需要思索的概念，处于‘最下层’就是划分的标准，这个标准的内容如果再详细一些，可能包括政治地位低下、经济上困窘、文化上教育程度低等，被称为底层的，可能三个条件全部满足，也可能只满足其中的一个条件。”^[6]“底层”概念的提出对于分析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文本中的底层形象、关注当代中国底层群体利益，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维度和批评尺度，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阶级性批评空缺的局限。“底层叙述”的话语体系呈现了“现代性话语的裂隙”，撕破了“现代性神话”的华丽外衣，展现出新时代语境下“社会最下层”问题。可见，新世纪底层文学的兴起不仅仅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强烈的现实思想根源，而且也呈现了当代中国作家的道义担当和文学使命感。

底层取代阶级概念，一方面避免了以往左翼文学所具有的阶级性叙述的模式化、简单二元对立的弊病，另一方面又继承了阶级概念所具有的追求正义、实现公平的革命性精神内涵。

1921年，耿济之在《〈前夜〉序》中详细分析了《前夜》的作者屠格涅夫所具有革命倾向性的写作姿态：

屠格涅甫实在是厌弃白尔森涅甫和苏宾两人学问和艺术的事业，而推崇段沙洛夫这种切志救国，铁肩担道的精神。然而读者不要误会：屠格涅甫并不是反对学问和艺术的事业，他也知道这种事业在社会上是很重要的；但是在俄国“当时”所最为需要的并不专是这种事业，却是需要实地改造的力量和精神。^[7]

屠格涅夫遗弃“学问和艺术的事业”、“切志救国，铁肩担道”的实地改造精神，与后来的中国左翼文学家宁肯牺牲文学的艺术性，也要追求